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政治

（中国政治）

民国要闻探秘

04

《民国春秋》编辑部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汤恩伯与“京沪之战”

自从1949年4月，蒋家王朝的最后一缕残阳从金陵城头消失，40年过去了。当年人民解放军挥戈江南的雄壮脚步声，至今仍如动地鼙鼓，在人们耳畔回响，而昔日的败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如今安在？

台北一家杂志曾透露汤恩伯病死日本的凄惨情景：1954年，汤恩伯去日本施行腹部手术。目击者说，他虽已上了麻药，但不知何故依然极端痛苦而不断挣扎，日本医官用力揪住他的身体，使他不能动弹，直至力竭而逝。台湾一名高级官员怀疑汤恩伯是被害死的。这位知名度颇高的官员说，汤恩伯是抗日名将，他的死很可能是被报复的结果。

真相究若如何，未见下文，而蒋介石却在汤恩伯死后第七天，对他施行“暴尸鞭骨”。蒋在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说：“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在上海保卫战中牺牲殉职，将是何等光耀；他在日本最后弥留之际，一定非常难过，回忆前尘，定会无限懊悔，抱恨终天。所以也值得我们检讨、痛惜与警惕。”

这一番话，说得国民党官员如一股凉气袭上心头。这意味着忠于蒋介石，只能死于丘谷，而下许善终床第，否则他便要“检讨”，便会让人“痛惜”并引起“警惕”！

在南京、上海的最后之战中为蒋介石尽忠效力的汤恩伯，绝想不到自己竟落个如此结局！

他拒绝光明

本来，汤恩伯除了战死上海或惨死异邦以外，还可以有另一个结局，一个光明的结局。

在1949年初，南京政府已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中国共产党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曾通过多种渠道，争取汤恩伯起义。汤恩伯观望过，犹豫过，但最终被愚忠思想所征服，以致失去良机。

第一个试图对汤恩伯施加影响的，是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陈仪。陈仪与汤恩伯，有着特殊的情谊。早年，汤恩伯在患难中，曾得到陈仪的关怀，从此两人情同父子。陈仪毕生无子嗣，视汤恩伯如己出。以后，汤恩伯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迅速发迹，地位甚至在陈仪之上，但两人关系不变。在蒋介石政权将要崩溃的前夕，陈仪受到在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的影响，想为人民做好事，便想与汤恩伯共同起事。1949年1月底，陈仪派他的外甥、地下革命者丁名楠去上海见汤恩伯，带去陈仪的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全文如下：

恩伯弟台如握：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与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由名楠奉告，并希台洽为荷。顺颂刻安。仪手启1月30日夜再为办事顺利计，请由弟处于丁名楠以秘书名义。

信中所说的胡邦宪，即共产党人胡允恭，长期为陈的僚属，陈亦清楚地知道胡的政治身份，只是彼此都没有明说。予丁名楠以秘书名义，是便于丁有一个公开身份进行汤、陈间的联络。

汤恩伯与丁名楠见面后，当即表示同意委任丁为秘书，并说胡邦宪先生

要来，随时都欢迎。汤还说，过不几天他将去杭州面见陈仪。

由于不见汤恩伯来杭，陈仪便又一次派丁名楠至上海，带去一份嘱汤恩伯起义的条款，分甲、乙两款，甲款是汤应当做到的，乙款是解放军方面将要做到的，全文如下：

甲：一、尽先释放政治犯。

二、保护区内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

乙：一、约定 地区，在区外停止，暂不前进。

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 X 月内改编原有部队。

三、取消 （按：即取消汤恩伯战犯名义之意），给予相当职位。

此外，还提出了八条准备事项，此处略。

汤恩伯依然没有拒绝的意思，只说他左右蒋介石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不料，汤恩伯一边在作敷衍，一边却告诉了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头目毛森。据 1987 年毛森在美国写的一篇文章证实，上述事件是在保密局并未察觉情况下，汤恩伯主动告诉他的。在这同时，汤恩伯又亲自向蒋介石告发，以致陈仪的计划败露，被撤去浙江省主席职务，并由汤恩伯予以关押。在这以前，胡邦宪在上海已发觉汤恩伯态度有变，两次紧急建议陈仪速作安全打算，陈仪却说：“我同汤恩伯的关系你是了解的，他不会出卖我。”

陈仪失去自由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另一渠道对汤恩伯再次进行策反。承担这一艰险任务的要角之一是传奇性人物陆久之。陆久之的夫人是蒋介石第三个妻子陈洁如的养女，所以他被视作蒋介石的“驸马”，其实陆久之早在 30 年代便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自己的才干，活跃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并与汤恩伯结成至交。

陆久之接受了策反汤恩伯的任务后，与汤恩伯作了几次试探性的谈话，发觉汤对在北平起义后的傅作义将军的处境极为注意，便详尽介绍了傅作义目前处境良好，有充分自由，劝汤恩伯以傅作义为榜样，早下决心。正当汤恩伯情绪动荡时，忽然，蒋介石亲自从奉化跑到上海来布置作战，汤恩伯情绪突然一震，便借口蒋纬国要住到他家来，阻止陆久之再来他私宅走动。策反又未成功。

汤恩伯两次拒绝选择光明之路，剩下的便只有战争一途了。由此，六朝繁华之地，被投入战火；无数士兵的生命，被汤恩伯用作绝望的一搏。那些被遗忘在江南原野上的亡灵们，鸣声啾啾，控诉着对于没落王朝的无限怨愤。

在两“君”相争中

南京、上海之战开始之前，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尖锐矛盾，并由此出现了两种作战方针。

受到美国支持的桂系领袖李宗仁，逼蒋介石交出权力。蒋介石由于在 1948 年 11 月美国总统大选中“押”错了“宝”，支持了社威，以致引起连选连任的杜鲁门总统的怨恨。蒋介石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援助，只得于 1949 年 1 月宣布下野，黯然离京，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

蒋介石下台后，表面上徜徉于溪口山水之间，似闲云野鹤，实际上依然牢牢控制着南京。他在下台前夕，已将汤恩伯从衢州绥靖主任（主管闽浙军务）调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回溪口不久，即于 25 日召见汤恩伯，同时去溪

口的还有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等；指示关于长江布防问题，决定划江防为两大战区，以江西湖口为界，湖口以西至宜昌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兵力40个师，25万人；以东直到长江口由汤恩伯负责，兵力75个师，45万人。白崇禧没有被召来开会，只在会后把上述决定通知了他。

蒋介石关于京沪杭战区作战的方针大致力：以长江防线为外围，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淞沪为核心，台湾为最后基地，依靠台湾优势海空军的支援，坚守淞沪六个月以上，等待国际形势大的变化。显然，在这一方针中，并不作坚守南京的打算。

李宗仁、白崇禧对这一方针并不知悉。李宗仁另有一套方略，其基本内容是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南北分治；如果和谈破裂，作战重点应放在南京及其以西地区；万一江防被突破，军队应及时向皖南转移，与白崇禧靠拢，以湖南、广西为广大后方，海南岛为最后基地。显然在这一方针中，并不打算固守上海。

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作战方针。汤恩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毫无疑问坚决执行前一条方针。汤恩伯是从担任蒋介石的参谋起家的，在新军阀混战时，他多次参与戎机，极为蒋介石赏识。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高兴得在汤恩伯这个下级军官面前唱起了宁波滩簧，这种“荣幸”不是其他下级所能得到的。旧中国流传着两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财团浙江军”，所谓“浙江军”就是指蒋介石最宠信浙江籍的三将领，一些阿谀的人称之为“军中三杰”，即浙江青田县的陈诚、浙江镇海县的胡宗南与浙江武义县的汤恩伯。

四月中旬，顾祝同主持江防作战会议，亲桂系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认为解放军最有可能从南京以西地段渡江，直下浙赣线，将京沪杭地区的国民党军孤立于东海之隅，而华南腹地则大门洞开。这一结果十分危险，因而他主张应根据这一形势，将兵力配置的重点放在南京以西地段。汤恩伯对这一主张根本不加理睬，会上他一言不发，会后却根据蒋介石的方针，作固守上海的准备，在上海外围构筑了大量钢筋混凝土的永久工事，甚至秘密将江阴要塞的大炮拆运至上海，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也由南京移沪。

就在蒋桂双方各敲各的锣的情形下，江防之战开始了。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谈判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强大的渡江战役。

上海“三剑客”

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在芜湖、铜陵间发起强渡，次日晨一举占领南岸的荻港。汤恩伯急忙飞到芜湖坐镇指挥，命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堵住缺口，并当面许杨为兵团司令，同时急令驻龙潭的九十九军（欠第九十九师）驰援。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援军尚未赶到，荻港等地守军已望风溃逃。当天下午，解放军东路军也在江阴、扬中渡江成功，江阴要塞在地下共产党员领导下举行起义，大口径的要塞炮掉转炮口猛轰国民党军脊背，宁沪铁路随即被解放军切断。与此同时，解放军西路军亦突破国民党江防，占领马当、贵池，汤恩伯的长江防线仅一天便全线崩溃，沿江各守军展开了一次逃跑比赛，但由于解放军进展神速，国民党第四军、二十军、二十八军、四十五军、六十六军、八十八军、九十九军（欠一个师）及其他杂牌部队共约30万人被歼灭于逃跑途中。23日，南京解放，延续22年的国民党南京政

府的统治，至此覆灭。

惊魂未定的汤恩伯，又急忙部署固守上海。上海的巨大财富、方便的海上通道以及有力的海空军支援，都使汤恩伯以为是用来守上海的有利条件，此外他还有“上海三剑客”的支持。这“三剑客”，便是谷正纲，方治与潘发展。

谷正纲原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社会部长，坚定的拥蒋反共派。当蒋介石宣布下野时，他当场痛哭流涕，自命“孤臣孽子”，当即辞去行政院一切职务，跑到上海，以在野身份协助汤恩伯的反共军事与政务。汤恩伯亦视谷正纲为患难至交。谷正纲自己就说过：“汤恩伯警备京沪，坚决反共，与我志趣相投，于是我便只身离京到沪，与他朝夕相处，代他主持政务，甚至参预军事机密。”

方治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从党务、民众、劳军等方面竭力支持汤恩伯固守上海待援。当上海战局紧张时，方治几乎天天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大喊大叫“保卫大上海”，吹嘘“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坐镇上海，国军必胜”。

潘公展，CC老牌骨干，这时为申报馆董事长兼社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他操纵参议会，助汤恩伯控制舆论。

也有人说，汤恩伯的“三剑客”另有其人，即陈大庆、石觉和毛森。

陈大庆，淞沪警备司令。他是汤恩伯嫡系将领中的“江西帮”首领，长期作汤恩伯的副手。抗战时期，汤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荐陈为副司令。战后，汤曾先后担任首都卫戍司令、第一绥靖主任及衢州绥靖主任，陈为副司令或副主任。汤调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后，陈又为副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两人一直如影随形。

石觉，上海防卫司令，长期追随汤恩伯，深得汤的宠信。1942年，汤把自己赖以起家的第十三军交给他，就表明两人关系的不同一般，人称他为汤的“干儿子”。辽沈战役中，十三军被打光后，汤又荐石觉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上海防卫司令，负责上海四郊作战指挥。

毛森，上海警察局长。此人虽属国防部保密局（其前身为“军统”）系统，但与汤关系密切。汤为衢州绥靖区主任时，他为汤属下的情报处长；汤调上海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后，他亦调沪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长兼上海市警察局长。两人过从甚密，毛森本人曾说：“我们两人间已无任何隐私”。

以上一文一武的“三驾马车”，构成了汤恩伯的主要班底，使他能独自控制上海的一切。加上参谋总长顾祝同、陆军总司令关麟征、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忏、装甲兵正副司令徐庭谔与蒋纬国，这袞袞诸公、赫赫列将，坐镇上海，确有血战一场的架势。

但事情并不能使汤恩伯愉快。在顾祝同召集的军事会议上，作战厅长蔡文治第一个起立发言，他指责汤恩伯指挥无能，不采纳他在南京会议上的主张，致使江防失守，浙赣线被切断，失去了与白崇禧之间的联系，弄到现在几十万大军困居上海，大家只有集体跳海一条路。汤恩伯立即气呼呼地站起，怒斥蔡文治：孩子之见，懂个屁！（蔡年纪较轻）两人都失去控制，大吵起来。为了震慑住蔡文治，汤恩伯把蒋介石关于长江下游的作战计划取了出来，说：“我执行的是总裁的指示，他要我固守上海，抢运金银、物资去台湾，完成后准许撤至舟山，如不能完成，唯我汤恩伯是问。诸位愿守上海就守，

不愿守的悉听尊便！”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

他们就这样迎接了上海之战的开始。

逃出吴淞口

当时上海守军，除原先部署在上海的三个军、一个师及六个交通警察总队外，还有从长江沿线溃逃下来的八个军、两个师与新近从浙东调来的一个军，共约 20 万人。

在溪口的蒋介石，十分担心失去上海。4 月 25 日，他突然命令太康号军舰准备起航。蒋介石上舰后，舰长请示航行目标。当蒋介石说出“上海”两个字时，舰上的人大惊失色。26 日，军舰进入吴淞口，下午停泊于复兴岛江面，当天即召汤恩伯至舰上谈话，先后召见的还有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谷正纲等。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虽已被代总统李宗仁免职，但实际仍操纵着特务机器，这次他亦被召晋见。蒋介石在沪 11 天，对上海军务、党务、特务等均作了精心策划，5 月 7 日乘江静轮离沪赴定海。

5 月 12 日，上海外围战打响了。解放军以第九、十两个兵团共八个军兵力，对上海采取钳形攻势，至 14 日，便占领松江、奉贤、南汇、嘉定、昆山、太仓等县城，完成了对上海的三面包围。次日，蒋介石急忙派蒋经国飞抵上海，问汤恩伯守住上海有无把握，汤恩伯回答说：“浦东方面没有把握，社会秩序是否将变得紊乱，亦未可预料，只有尽力而为之。”反映了对战局前途的悲观。

战场上的形势果真越来越严重，国民党军队的防区迅速被压缩，至 16 日，守浦东外围据点的第五十一军和守浦西外围据点的第一二三军，均遭歼灭性打击。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被俘，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躲进他的堂兄顾祝同的公馆里伺机溜走。

蒋介石得知战局危急，又一次坐飞机进入上海，直接插手指挥，但局面已烂到不可收拾，何况蒋介石本来就不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东北就是在他亲临指挥的情况下丢失的，山东也是由他坐在飞机里指挥而打了大败仗，现在他又来到了上海，他能创造奇迹么？19 日，解放军第九兵团攻占川沙，逼向高桥；第十兵团肃清了月浦、刘行残敌，向吴淞推进，两支大军如一把钳子，将要卡住黄浦江入海的咽喉。蒋介石见状，急忙于 20 日坐兵舰逃出黄浦江，返回马公岛，从此永别了他发迹之地。

汤恩伯还想作最后挣扎。他下令征用全市机关、商家的大、小汽车，司机一律自带铺盖，将车辆开到指定地点集合。随后又下令全市三轮车、黄包车亦全部投入军运，违者严惩。汤恩伯又命令在市区边缘防御阵地之前三—五华里以内的建筑物全部拆毁，仅这项命令，就使得近 80 万人成为难民涌入市区。为给连打败仗的军人打气，汤恩伯下令集中全市娼妓，供军官和士兵消受（后未实行），又在国际饭店设立“英雄馆”，让所谓“英雄”轮流来此娱乐和休息。尽管如此，战败的消息依然雪片般飞来：

20 日，守高桥的第十二军大部被歼；

21 日，机场进入解放军炮火射程，空运瘫痪；

22 日，浦东第三十七军仓皇抢船，渡回杨树浦；

23 日，上海已面临最后决战的前夜，这一天也就更显得紧张而富有传奇性。

这天，汤恩伯开始准备逃走，将指挥部移到了吴淞口外一艘兵舰上，却又让方治到广播电台向全市大叫“共匪进攻上海失败了”；

这天，汤恩伯驱使非嫡系部队上第一线，要他们“与上海共存亡”，却在同时把嫡系部队从前线后撤，准备悄悄上船；

这天，代理市长陈良竟然向全市市民号召“消灭细菌”，“扩大清洁运动”，制造和平安逸气氛，而在同时，各监狱却开始杀害政治犯，仅南市区就杀死 130 余人；

也是在这一天，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总部发出了总攻上海的命令，第九、第十兵团当夜全线出击，仅一天时间，便于 25 日攻入市区，进行巷战。汤恩伯慌忙率残部逃往舟山等地。27 日，全市解放，国民党军被歼者共约 15 万余人。

汤恩伯逃到台湾后，又遇上了新的麻烦。

不尽的烦恼

上海解放后不多天，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搭乘一艘外国轮船前往香港并转赴台湾，这人便是被汤恩伯遗弃在上海的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闾。三十七军奉命在江湾待命，等待很久无人理睬，派人联络才知道汤恩伯等早已逃之夭夭。罗泽闾上天无路，入海无船，便换上便衣，躲到了四川路一友人家，找到了机会后逃出上海。

罗泽闾一到台北，便向汤恩伯发起猛烈进攻，而石觉、陈大庆等则对罗反唇相讥，双方越闹越凶，迫使蒋介石下令召开上海作战检讨会以求解决。

会议由陈诚主持。罗泽闾指责汤恩伯身为战场最高指挥官，却率先逃跑，弃部队于不顾，此种行为，何以对党国，应自杀以谢天下。几句话骂得汤恩伯暴怒起来，指责罗泽闾作战不力，失去阵地，也应自杀。两人激烈对骂，别人无法插嘴。最后，会议决定交给军事法院去解决。后来通过疏解，这桩官司不了了之。

但汤恩伯耳边的责骂声，仍未间断。而更使他难堪的，还是陈仪之死。起初，在蒋介石下令逮捕陈仪时，汤恩伯曾向蒋介石提出，保陈仪一条命，据说老头子是同意的。但 1950 年，蒋介石却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年 6 月，陈仪被处死。汤恩伯自知陈仪是死于自己的告密，不免良心发现，深深自责，在家中设了灵堂，晨昏祭奠。这事又被蒋介石知道了，下令撤去灵堂。据说自此以后，汤恩伯常绕室彷徨，不知所以，不久退休住到三峡乡间，终致重疾。因无钱去美国治病，便选择了日本。在日本住院期间。曾写信向陈诚告贷。1954 年 6 月 29 日，汤恩伯死于术中，时年 54 岁。

台湾军界旧人黄杰在挽诗中有“最怜墓草青还在，风雨年年怆客魂”之句，可以看作是对汤恩伯末路凄清的叹息。

徐矛

柳亚子“非常可骇”的建议

恽代英逝世后，柳亚子作诗五首哀悼，并在其中一首诗下自注云：“余在广州，曾建议为非常可骇之事，君不能用。”这首诗全文为：

百粤重逢日，轩然起大波。我谋嗟不用，君意定如何？矢日盟犹在，回天事已讹。苍茫挥手别，生死两蹉跎。

1926年4月，柳亚子在上海第一次认识恽代英。5月，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与恽代英重逢。本诗回忆的即是这次重逢的情景。从诗和注可以看出，当时柳亚子曾向恽代英提出了一项“非常可骇”的建议，而恽代英不能采纳，柳亚子失望地离开了广州。

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柳亚子1950年12月16日在民革中央的讲话，事情是这样的：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候，距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还不到两个月。为了夺取和控制党权，蒋介石便以“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为名，提出“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在高级党部中任职提出了种种限制。柳亚子是个政治上很敏感的人，他迅速识破了蒋介石的意图。为了维护孙中山制订的三大政策，他和国民党左派朱季恂、共产党员侯绍裘二人一起找到了蒋介石，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柳亚子质问蒋介石：“你到底是总理的信徒，还是总理的叛徒？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就应当切实地执行三大政策。”蒋介石答道：“政策和主义不同。主义亘古不变，政策不妨变通一下。”柳亚子驳斥道：“你不懂得政策和政略的分别。政略是可以随时变换的，政策就不应该轻易放弃。就以政略而论，必须环境变化才有变通的必要。总理生前，为了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所以定下了伟大的三大政策。现在帝国主义鸱张犹昔，北洋军阀虎负如前，而买办资产阶级，以广州而论，就曾挑起了商团之变。这些事实，难道你身负党国重任，还能瞠目不睹吗？”柳亚子的这一席话把蒋介石说得面红耳赤，默不作声。说完，柳亚子等便拂袖而去。

和蒋介石交锋之后，柳亚子断定蒋介石一定要做陈炯明第二，闹出更大的乱子来，必须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他和朱季恂、侯绍裘等四出活动，都不得要领。最后，柳亚子找到了正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向他建议，用张良对付秦始皇的办法，找一个刺客去结果了蒋介石。恽代英不同意，说：“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要留着他打仗呢！”柳亚子一听就急了，争辩说：“北伐为的是什么呢？不是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吗？倘然让这种总理的叛徒去统一中国，结果一定比北洋军阀还要糟糕。在杨希闵、刘震寰割据的时代，总理说过，他们戴了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是非常痛心的事情。照我的意见，与其让蒋介石戴着中国国民党的帽子，来做出卖民族的勾当，还不如让北洋军阀打进来，连广州都不要。因为后者还不过是军事上的损失，随时可以卷土重来。而前者呢？把中国国民党的金字招牌，丢到粪坑里去，将来就是有人把它捞出来，三熏而三沐之，恐怕臭气熏蒸，还是叫人家不容易忍就吧！所以，照我的主张，就非立刻出重赏，求勇夫，把蒋介石打死了再讲。不然，将来的后果，我就不忍说了。”恽代英不相信事情有那样严重，开玩笑地说：“人家叫我们共产党作过激党，认为洪水猛兽。你老哥的看法，却比我们共产党还要深刻到几十倍。那末，应该在过激党上面，再加一个过字，称你老哥为‘过过激党’吧！”谈到这里，柳亚子站起

来拉住恽代英的手严肃地说：“我们是好朋友，好同志，玩笑是玩笑，正经是正经，你今天不赞成杀蒋介石，怕蒋介石将来会杀你呢！”说着说着，便掉下泪来。这时，恽代英也感动了，安慰柳亚子说：“我们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柳亚子和恽代英谈话之后十多天，接到老母病重的电报，不得不离开广州。行前，他去黄花冈祭扫廖仲恺墓，有诗云：

乱草斜阳哭墓门，从知人世有烦冤。风云已尽年时气，涕泪难干袖底痕。何止成名嗤阮籍，最怜作贼是王敦。匹夫横议谁能谅？地下应招未死魂。

王敦，东晋初大臣，曾起兵进攻建康（今南京），图谋夺取司马氏政权，这里借指蒋介石。“匹夫横议”，仍指“非常可骇”的建议。柳亚子慨叹失去了廖仲恺这样一个优秀的同志，无人能够理解他的思想。

共产党人是光明磊落的，收买刺客去暗杀蒋介石，这样的事共产党人是不不会干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些领导人当时确实对蒋介石图谋叛变革命、排斥共产党人缺乏足够的警惕。恽代英所说：“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要留着他打仗呢！”这两句话反映出共产党某些领导人的麻痹情绪。柳亚子提醒恽代英：“怕将来蒋介石会杀你呢！”果然，1930年，恽代英在上海被捕，次年4月29日牺牲于南京狱中。柳亚子不幸而言中了。

杨天石

（第287页为柳亚子照片）

截阅蒋家父子家信的一段亲历

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当年，我曾有过一次“小偷”行为，如果当时被人发现，肯定人头落地，活不到今天。

现在我已年逾古稀，为了使读者在读史中博得一笑，今天为文“坦白交代”出来。在台的蒋纬国先生如能看到，可能一笑了之曰：“坦白从宽，免于追究。”

1941年，我考入西安邮局，分配负责邮袋拆分工作。凡各地来的邮袋，拆开，平信分送平信组，挂号分送挂号组投递或转口。当时，国民党特务机构派有专门检查员，不时来邮局检查信件，他们站在旁边监视，虎视眈眈地盯着邮件。凡转口去东路上海及去北路延安的平信，不分青红皂白，一把一把的拿走，带回检查，第二天有的送还，有的不还；对于挂号信，拿走时必须履行登记，第二天原件送还，如不送还，则必须办理扣押手续。

在这些信件中，我发现每三、五天总有“华县第一军蒋纬国收 重庆军事委员会蒋斌”的大牛皮信封的信件。那时蒋纬国从德国学习军事，归国不久，蒋介石把他安排在第一军实习。检查员每每拿起看看，后又放下，他们相顾一笑，但最后还是拿走了。第二天送还时，我和同事何修注意到密封口（封口上另贴一白纸条）留有拆痕，就提出：“收信人看出马脚，追查下来谁负责！”他们说：“我们为了蒋公子的安全，奉命拆的，不会追查。”这个底一漏，我就和何修商定了偷看蒋纬国家信的“密谋”。为一时的好奇心所驱使，我们才做出这种不足为训的事来。

几天以后，拆袋时又发现有蒋纬国的信，我和何修会心一笑，趁检查员未到之际，很快塞进衣袋，下班回宿舍，闭紧门窗，用刀片轻轻启开，看完后小心封上。何修是集邮迷，对撕取外国邮票有独到技巧，拆后还原不留痕迹。前后共看了三封蒋介石给蒋纬国的信。老实说，以当时一颗好奇而纯真的青年人的心，对蒋介石训子的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三封信大意是：

一封是教育蒋纬国不要藉老子的声名，流露出任何骄傲和盛气凌人情绪。在实习中，要虚心向长官学习，不要自认为曾在德国留过学，就看不起别人。

一封是教育蒋纬国不要藉老子的名义，过问上级的任何事情，也不要向老子禀告部队的情况，否则是违背总理精诚团结的教导的。

一封是教育蒋纬国在实习中，抽空读些论语、唐诗，要经常写日记，要每周写一封家信，禀告生活学习情况。

可惜我不能背诵其原文，也未能拍照留影。我没想到今天能写这史料啊！

蒋介石的这三封信，有时写“纬国儿见字”，落款写“父字”，这是曾国藩手法，蒋介石是最爱《曾国藩家书》的。有时落款“蒋中正”。都是较恭正的毛笔楷书，用直八行贡纸信笺，一页成书，可谓精致。

那时，国民党军委会曾设有军邮袋，军事重要文件专封军邮包，仍无专线运输，附在民邮邮袋内，由邮局代运代送。以后设军邮局，才专线运输，但不久又撤销了。这段邮运史，我未专门研究。但一般军队私人信件，仍以民邮寄发，蒋介石的私人家信，也都夹在民邮中寄发的。我当时亦感到不可思议。我在邮局只工作一年，以后就转入报界去了。

彭古丁

蒋介石宜兴认祖祭扫

关于蒋介石的身世，自唐人的《金陵春梦》问世后，始终存在两种说法。一说他是河南许昌灵沟镇人。其代表人物当然是唐人。另一说他是浙江奉化人氏。比较一致和流行的是此说。

至于蒋介石本人不论在什么场合，公开的、私下的，抑或在日记、文稿和讲话中，对自己的籍贯均持后说。在现在能见到的材料中，蒋介石皆自称“武岭蒋氏”或“浙江奉化武岭”。蒋氏家族修的族谱，题签也是《武岭蒋氏宗谱》。武岭，亦称武山，在奉化溪口镇东首，屏障全镇，为溪口的门户。蒋介石虽未说自己与河南许昌郑氏有无瓜葛，但河南郑绍发前来南京认弟，尽管未能见到“胞弟”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并没有为难他，在把郑绍发“资送”回原籍河南后，给了他一个“步兵少校”的军衔，嘱咐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不要忘记给郑绍发开薪一事，却又让人疑窦顿生。由是，对蒋介石的身世籍贯的两种说法，是家喻户晓，历经几十年而不衰，而且随着海峡两岸形势的趋向缓和，又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成为社会性的“长久话题”。可是蒋介石曾到江苏宜兴寻根、认祖、扫墓、修祠一事，却几乎无人知晓；蒋介石的先祖乃是江苏宜兴人，更是“黑匣子”。

笔者因课题研究的需要，曾去宜兴市调查，承该市几个有关部门的热情协助与支持，在调查中发掘到一件已被人们遗忘的事——1948年蒋介石偕宋美龄前来宜兴寻根、认祖、祭祀先人，嗣后又拨专款修葺当地蒋氏宗祠。

蒋介石、宋美龄为什么会到宜兴去认祖祭祀呢？难道这里真有他的先祖坟陵吗？

回答的答案是肯定的，蒋介石的先祖的确是江苏宜兴人氏。而蒋氏伉俪去祭祀的缘由则是因宜兴县县长蒋如镜的一封信所引起的。

抗日战争时期，宜兴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成立了“维持会”和伪县政府。宜兴沦陷后，当地的国民党县政权就成了流亡政府。抗战期间，国民党宜兴县长并换了6届。这第六任县长叫蒋如镜，是本地徐舍下滩村人，1943年11月至1946年6月任职宜兴县长。为了躲避日本侵略军与汪伪军的追剿，他经常背着背包在宜兴各处办公从事抗日斗争。这位县长是文化人出身。1938年他与潘韵笙共同创办了《宜兴报》，1941年6月1日，他又创办了《民锋报》。其此编《民锋报》曾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办的《新江苏报》合出“中外电讯”，隔日刊出一期，报道世界各地抗击法西斯以及国内各地抗日斗争的新消息。正是因为这位县太爷是文化人出身，无论有事无事，总是喜欢涉猎古籍。他从宜兴《蒋氏族谱》中发现了宜兴蒋氏与奉化蒋氏是同祖、同宗。于是就有了给蒋介石的上书。

那么，宜兴蒋氏是怎样的一个家族呢？蒋如镜为什么能把宜兴蒋氏同奉化蒋氏拉扯到一起，是同祖同宗呢？难道他有什么确凿的史料根据吗？否则，蒋介石为何会轻而易举地相信了呢？

据宜兴同志介绍，宜兴蒋氏在民国时期以及之前一直是当地的大族。笔者为了取证这一点，曾在南京，还有江苏的其它几个城市，向一些从事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老先生做过访谈，无不知晓宜兴蒋氏乃是当地大族。

宜兴蒋氏始祖乃是东汉初的 𠂔亭乡侯。其家族史，据南宋咸湾年间（1265—1274）的《毘陵志》记载：𠂔亭乡侯蒋澄，字少明。其父蒋横，东汉初官拜将军之职。蒋横共生9子，蒋澄乃其少子。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

年），蒋横随刘秀征讨赤眉军有功，被封为浚道侯，其后遭中央监察官、号称“三独座”的司隶校尉匡路的诬陷而罹死刑。他的9个儿子通通被迁徙。蒋澄与兄蒋默，遂迁徙到阳羨（即今江苏省宜兴市）。后来蒋横的冤案平反昭雪，匡路也因此受到族诛的处治。而蒋横诸子皆受封拜官。蒋默封云阳侯，官拜谏议大夫。蒋澄封 𠄎亭乡侯，任婺州刺史。蒋澄性格豪爽，任上颇有政绩，受到过朝廷嘉奖。蒋澄60多岁时致仕回到阳羨。他赋闲居乡，热心公益，多次捐资修路、筑桥、扩建修缮祠堂，对本族与毗邻之贫困人家亦不时有所周济，在当地甚有声誉。71岁时无疾而终。当地乡人为纪念这位德被乡泽、为官清廉的老人，争相为其立庙祀之。这就是宜兴城内东庙巷及官林镇上各有一座 𠄎亭侯祠的来历。蒋默、蒋澄之子、孙以后分别任过前将军、丹阳太守、荆州刺史、兖州刺史，有的封侯，有的袭爵，成为宜兴的名门望族。坐落在官林镇上的 𠄎亭侯祠（原与今天的官林小学毗邻），是一座有三进院落，有门厅、正厅、后楼的青砖瓦木结构建筑。抗日战争时期，毁于兵火。庭院中仅残一碑，碑额篆刻“九侯世家”四字尚清晰可辨。

蒋如镜在卸任前夕，给蒋介石上书，在介绍完了蒋氏的这段家史后，又把宜兴蒋氏挂到了周公姬旦的身上，说蒋澄先祖是助西周武王灭商的周公的第三子伯龄。接着笔锋一转，又非常巧妙地把宜兴蒋氏与奉化蒋氏嫁接上。在一段分析之后，蒋如镜在给蒋介石的上书中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奉化蒋氏与宜兴蒋氏是同宗、同祖、同根生。”蒋如镜把宜兴蒋氏宗谱用红锦缎包裹好，封上信，派专人送到南京。

平心而论，蒋如镜所述一切，不是他个人的信口开河，杜撰出来的，根据史料记载，蒋澄的后人，在东晋时从江苏宜兴迁到浙江台州。蒋介石在未发迹以前，也认为奉化蒋氏是大世家。他在民国九年（1920）12月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吾蒋氏在唐代由台州迁奉，楼隘或即俗呼楼岙者便是之蒋浚明公，官至金紫大夫，即此派也。其墓在三岭山……摩珂蒋宗霸公，世传为吾祖，谱中所称必大公者是也。当王季之周，其居三岭，与岳林寺之弥勒相友善，亦近情理……”

可见蒋介石是认为自己是 由台州迁到奉化的“官至紫金大夫”的蒋浚明的后裔。再往前，蒋浚明的先祖又是谁，中间缺了一段，蒋介石自己也弄不清楚。如今见到蒋如镜的信和宜兴蒋氏宗谱，如获至宝，正好弥补了蒋氏世系溯源中断的缺憾。由此看来，蒋介石更早的祖籍当是江苏宜兴无疑。再说蒋介石看完了信立即嘱咐侍从室派人到宜兴调查，并交待下来：不要走漏消息，惊动中央各部委与要员们，以免贻笑于人。来人在蒋如镜陪同下实地查看了都山的 𠄎亭侯冢等几处遗迹，还看了宜兴城里已毁于兵燹的 𠄎亭侯祠的遗迹。蒋如镜又让当地士绅蒋耀坤详细介绍了宜兴蒋氏家族的世系情况。来人问得很仔细，做了认真的记录。不过蒋介石在听取了侍从室调查人员的报告后，并没有表示要来宜兴，只是不置可否地“嗯……嗯”，以表示知道了。因为这时他有更重要的事——急于消灭共产党，正积极部署对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的进攻。另一方面，在还没有仔细研究这一事情的可信程度之前，也不便于立即明确表态。此后，随着战事的吃紧，蒋介石始终没有能来宜兴。蒋如镜原以为蒋介石会即刻来宜兴认祖祭扫，自己也可风光一下，说不定能够再弄它一任县长干干。可是直到1946年6月底他卸任回乡，蒋介石都没有来宜兴。（1950年蒋如镜被宜兴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罪镇压。）

到了1948年5月初，宜兴县政府突然接到南京方面的通知：蒋介石要来宜兴扫墓。当时的国民党县长是李乙飞，见函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闹不清蒋介石要来宜兴扫的哪门子的墓。因为当年蒋如镜考证宜兴蒋氏与奉化蒋氏乃“同宗、同祖、同根生”只有参与其事者知晓，也未有公案留存，也就难怪李乙飞莫名其妙了。后来几经辗转，在宜兴徐舍下滩村找到了闲居在家的蒋如镜，才算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回到县里，李乙飞就忙开了，先带人去勘查都山 冢亭侯墓。这 冢亭侯墓坐落在都山荡边的都山上，依山傍水，景色优美。不过这座千年古墓，到这时已是荒冢，墓前残留着石台、石凳和一块字迹不清的墓碑。墓地面积约3亩，据说原来的面积有5亩，由此也可想到当年的气派。李乙飞交待县政府派人立即清除杂草，把通至墓地的小道修整，并在蒋介石要经过的几个主要地方和桥镇、徐舍和宜兴县城都布置了欢迎队伍。

5月17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及侍从警卫一行，分乘5辆小车，没有前呼后拥的大队车马，轻车简从，沿当时的京杭国道（即后来我们说的宁杭公路）于上午10时许抵达宜兴徐舍镇。县长李乙飞率宜城缙绅蒋湘叔、徐舍的许楚箴和都山的蒋耀坤等在此迎候。这批人被蒋介石邀请同乘预先备好的专用汽艇直驶都山墓地，之后，从人弃舟登山，步行约两华里到了 冢亭侯墓。蒋介石在都侯墓村（今蒋家村）问有无同族年长者，蒋耀坤推荐了年逾古稀的朴实老农蒋田福，蒋介石接见了，并客气地邀请他一同参加扫墓仪式。

在稍事休息后，举行了扫墓仪式，首先由蒋介石献上从南京带来的大花圈，蒋氏夫妇继而向侯墓鞠躬示敬，接着按年龄长幼分批向侯墓鞠躬。仪式很简单，没有上供品，也没有燃香烛。

蒋介石一行祭扫完毕，仍坐汽艇于下午2时回到徐舍，随即坐车沿京杭国道转锡（无锡）宜公路去了无锡，未在宜兴城内停留。

以后，蒋湘叔、蒋耀坤两次上南京谒蒋，请示修理宜兴城内 冢亭侯祠事宜。蒋介石拨了专款把祠堂修缮一新，并亲题“世德清芬”匾额。此匾制好后高悬于祠堂正厅中央。匾额上沿正中有一朱红大方印：“中华民国总统印”，下款为“蒋中正”三字。

祠堂正厅，新塑蒋澄坐像一尊，后厅悬挂蒋澄画像一帧。画像是蒋氏家族历代祖传，确系古画。“文革”中尽被毁去，使调查者无以得见。

附记：在调查中，承蒙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及有关人士的热情接待与协助，更感谢当年在宜兴办报如今均已是耄耋之年的几位老先生，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才得有了此文的材料。

赵映林

蒋介石三次“引退”

以退为进，初次“引退”

1927年8月14日，南京和上海等地的报纸赫然刊出蒋介石“下野”的消息。这位权倾沪宁、煊赫一时的“总司令”，刚遨游上海回到南京不久，为什么在戎马倥偬之际，突然“卸甲”呢？正当人们议论纷纷时，8月16日上海《申报》刊出《蒋中正下野之经过》——，系记者采访“总参议”张岳军的谈话，说“此次最近战事，一方对北，一方虑及武汉。奉之对冯，宁之对鲁，汉之对宁，适成犄角之势。故蒋自前线归来，默察大势，内省诸躬，为党之团结及政府前途计，决心下野”。张的一席之谈，无非想为蒋介石的下野作一番辩解。但也难免道出了一些真情。

1927年七八月间的形势确实对蒋介石有些不利：这年4月14日，蒋介石另立中国国民党中央，18日在南京又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5月，蒋介石

石调集军队过江北伐，与冯玉祥会盟徐州。就在这时，汪精卫在武汉通电表示要蒋介石“下野”，否则将予军事讨伐。6月23日，唐生智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举兵东下进窥南京。27日，蒋介石急忙下令从徐州前线抽调主力分别到皖赣一线和浙江一线防堵武汉的“东征军”，致使徐州前线兵力空虚。直系军阀孙传芳和山东张宗昌联合，率直鲁联军组织反攻，夺回徐州。蒋介石亲到徐州前线督战，仍频频失利，大军沿津浦线往南溃退，旬日之间两淮尽失。而唐生智又以“东征军总指挥”名义，连续通电要蒋介石“下野”。政局就如张岳军所说“适成犄角之势”，对蒋介石很是不利。

8月6日，蒋介石从津浦路前线回到南京，随即搬到东郊汤山别墅，和何应钦、陈布雷等一班人商量对策。蒋介石的客厅里整日气氛沉闷，在一次又一次分析北、西两线形势后，何应钦和陈布雷等都认为，要摆脱困境，关键要看掌握百里江防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态度。如果李、白态度暧昧，则“总司令”别无他路，唯有“下野”。蒋介石经数天的忧虑后，沮丧地说：速电在芜湖的李宗仁到汤山来，同时嘱陈布雷赶紧拟就一张“引退”文告。

8月11日，李宗仁从芜湖回到南京，“就掉转车头，向汤山疾驰而去”。据《李宗仁回忆录》说：一见面，蒋就对李说，“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我现在决心下野了！”

李闻言，吃惊他说：“胜败兵家常事，为什么要下野呢？”

蒋仍摇头说：“你不知道内幕，情形复杂得很。”

蒋介石叫李宗仁到南京的目的不是商讨军事，是摸李的底；李知道蒋在摸底，所以一面劝蒋不可下野，一面说：“现在津浦线上，我军已溃不成军，局势十分紧张。敌人已逼近蚌埠，旦夕之间即可到达浦口，威胁首都，武汉方面又派兵东进。……”蒋介石一听李的言下之意，确是有点“暧昧”，随即拿出一张拟好的文告交给李宗仁。李宗仁拿了文告后即下楼和何应钦等一班人见面。这时何应钦、李宗仁、陈布雷、戴传贤、陈铭枢等许多文臣武将又紧张地议论开了，议题逐渐从蒋的去留问题转到对文告内容的推敲。12日，蒋介石在汤山召集党、政、军要员会议，嘱把文告电达武汉汪精卫，上海胡汉民等，并把军、政大权交何应钦、李宗仁等负责。蒋即于当晚7时乘火车去上海，次日转去奉化，身边仅带12个卫士。

蒋介石的“下野”文告洋洋千余言，一面表露其北伐和清党之“大功”，一面把武汉政权与之对立之责任推在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身上。文告最后说：“中正复有何求，今既疚戾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因文告预先拟就，所署日期是8月8日。

蒋介石一下野，武汉方面就失去了“东征”之口舌。当“下野”文告电达武汉后，汪精卫于15日“有十万火急电，由九江拍至南京，请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速到九江会议”。8月22日，李宗仁等代表南京方面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在九江庐山会议，双方取得妥协，缓住了唐生智的“东征军”。李宗仁回到南京后，与何应钦、白崇禧等于8月26日至30日的五天时间内，在龙潭全歼孙传芳渡江的11个师，扭转了危局。9月间，宁汉沪三方代表在南京开会，联合组成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南京“国民政府”。接着，桂系又联合西山会议派迫汪精卫“下野”。10月，李宗仁挥师西进，将唐生智部击溃，唐部10多万军队尽为桂系收编。

正当桂系势力在南京、武汉日益膨胀之际，蒋介石从溪口到了日本，与日本政界人士广泛接触，尤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长时间“恳谈”，取得“谅解”。11月10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恰逢汪精卫从广州到上海联络组织力量，遂抓住时机串通一气，互相支持，相约同时复职。12月3日，蒋介石支持汪精卫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汪精卫力推蒋介石复职。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想对张作霖作战，也主张蒋复职。何应钦则要蒋出来“主持军事”。这样，预备会议顺利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议题，并决定由蒋来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当即解体，胡汉民、孙科等一班人被迫“出洋”。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桂系借机攻击汪精卫等对广州起义负有责任，蒋介石鉴于复职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参与劾汪。汪精卫也被逐“出洋”。蒋介石于1月4日从上海抵达南京“主持大计”，9日正式通电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拥有实权的职务。

内外交迫，再次“引退”

1930年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长，蒋介石未经立法院通过，与日本签订了《关税协定》，因而胡对蒋不满。蒋又擅自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胡更不满。1931年初，蒋介石坚持要召开“国民会议”，另制《训政约法》，胡汉民认为“总理之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中之对内政纲，较任何约法都完备，无需再作出钦定式之约法”。蒋听此言甚为恼火。2月26日，他派人给胡汉民送去一个请柬，约28日于总司令部晚餐。28日晚胡开完会到达司令部，不见有宴，只见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一人坐在那里。不久蒋介石出来相见，两人发生争执，蒋即下令将胡汉民软禁，后送去汤山。

胡案发生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起来，粤派要人纷纷离开南京去广州，有孙科、古应芬、王宠惠、刘纪文等。汪精卫和邹鲁乘机活动指责蒋介石。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因监委正式提出“弹劾”案，要蒋介石“下野”。蒋被迫向中央监委“自请查办”。在两广方面，陈济棠、陈策、李宗仁、张发奎等相继通电响应，要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而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发出“忠告陈济棠”之通电，进行对抗。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于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

发表宣言，指责南京之“党部为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晚又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28日，在广东省政府二楼举行“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又在燕塘阅兵，分别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第四两个集团军，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双方剑拔弩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以及各中等学校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示威，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9月28日，学生冒雨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被迫出来“接见”。11月24日，全国各地到南京请愿的学生5千多人到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对他们说：“如三个月内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学生们不信他的话次日在国民政府的大门前悬挂一口大钟，不时敲打，以示警告。蒋介石被迫“手书”答应学生“抗日”。

在学生要求抗日的同时，各省响应东北马占山的抗日运动，纷纷指责蒋介石，要求出兵抗日。蒋介石内外交困，终于“软”了下来。蒋先派陈铭枢携亲笔信去上海说项，又派蔡元培、张继陪陈去香港与粤方会晤。9月28日和29日，粤方之汪精卫、孙科等与陈铭枢等会谈于香港，议定由蒋介石先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机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即行下野”。接着双方在广州退思园开会，粤方坚持“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蒋方代表向南京请示，蒋复电表示只要粤方要人到南京，当即“通电下野”。10月初陈铭枢返沪，由陈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兼淤沪警备司令，调十九路军进驻沪宁卫戍，保证粤方要人安全。10月24日，粤方要人与蒋介石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宅举行会议，前后开了七次，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于11月7日达成协议，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南京国民政府，俟改组后，广州国民政府当即取消。12月15日，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之下被迫宣布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26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为合议制，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蒋介石虽然下野，仍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蒋在下野前已布置亲信，控制了军队等要害部门。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权攘利并未停止下来，在广州出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构。陈济棠倡议“西南五省大团结”，何成濬又发起“九省联防”，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等也在筹划“北方六省大联合”。国民党四分五裂。1932年1月4日，孙科迫于形势，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南京政权出现危机，亲蒋派乘机提出“请蒋介石到南京主持中央政治会议”之动议，当即得到通过。2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3月6日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三次“引退”，全盘失败

1948年底，东北、华北全境解放，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占领，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不但为中国人民所唾弃，连美国政府也对他不满。

早在1948年10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有前途的其他国民党领袖人物上台执政。11月16

日孙科接任行政院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遣其亲信傅径波去见孙科，表示美国之态度，“欲实现国共和议，非蒋介石去职不可”。美国的态度使蒋介石非常着急，他立即派夫人宋美龄飞往美国访晤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支持”。但未得结果。12月24日，拥兵50万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武汉通电提出“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蒋介石“下野”等要求；紧接着李宗仁与甘乃光等又提出五项和议主张：1.蒋介石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后撤30里；5.划上海为特别市，作为和谈地点。接着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四省相继通电主和，并要蒋介石下野。除夕日，蒋介石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征询意见，除谷正纲等少数几人外，其余一致认为蒋是和谈的主要障碍，应当去职。蒋介石深知这不仅是同僚们的意见，就是美国政府也对他打问号了。遂于1949年1月1日发表《元旦文告》，说“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1949年1月8日，

蒋介石嘱外交部长吴铁城以《和谈决议》通知美、英、苏、法四国驻华大使，请其协助完成和谈，均遭拒绝。9日，蒋介石一面派张群、黄绍竑去武汉和长沙，听取白崇禧和程潜的意见，一面调整南方各省之党政军要员，安排后路。18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彭孟緝为副总司令。19日任命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蒋介石既不能打下去，又没有“和谈”之可能，只得于1月21日“引退”。1月21日下午4时，蒋介石乘飞机到杭州，次日到溪口。蒋经国在他写的回忆录《风雨中的宁静》一书中说：“父亲引退，离开南京，临行时候，曾到紫金山国父陵寝谒别。当天晚上到达杭州，就住在览桥空军军官学校，那时父亲的心情当然显得十分沉重。”

陆仰渊